

細的「英雄譜」，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，這既非學術史，也不是排行榜，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，以他的眼光、趣味與人脈，勾勒出來的「當代中國人文學」的某一側影。若天遂人願，舊雨新知不斷加盟，衣食父母繼續捧場，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，我相信，這一「圖景」會日漸完善的。

最後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：第一，作者不限東西南北，只求以漢語寫作；第二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，目前僅限於人文學；第三，不敢有年齡歧視，但以中年為主——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，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。這三點，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

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

目錄

前言·····	001
中國歷史上中央地方關係變遷概說·····	007
縣制起源三階段說·····	041
從漢代「部」的概念釋縣鄉亭里制度·····	065
《聖諭》、《聖諭廣訓》及其相關文化現象·····	083
作者簡介·····	203
著述年表·····	204

卷，所用滿語亦與乾隆以後的新語不同。又據《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》載，鑲白旗蒙古都統臣齊爾薩曾奏請將《聖諭廣訓》「譯成蒙古話兼清文賞給八旗察哈爾地方總管等，不時教習其屬下官兵」。因為原來發給八旗察哈爾的只是以滿漢兩種文字刊刻的本子，而該八旗既不識滿漢文字，也不通滿語，所以提出此要求。由此看來，滿蒙文合刊的《聖諭廣訓》當比滿漢文合刊要晚。筆者曾在南開大學圖書館看到一種《蒙漢合璧聖諭廣訓》，無序跋，書末有「非賣品」及「蒙古文化館印」等字樣，自然是晚到清末的印本。另外還有漢、滿、蒙三種語言對照排列的《三合聖諭廣訓》，不知始刻於何時，刻於同治十三年的一種，四冊共二百四十八頁。大開本，可與《御製翻譯四書》相媲美。此書之刊刻說明清末統治者認為其祖宗的教導是超越時空的，不但從清初至清末依然可用，而且對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也都適宜。滿文本在清朝中期可能還有其實用價值，如和刻本《聖諭廣訓》所附（至遲是乾隆年間所下達）的公文說：「各省將軍提鎮命令管下，府州縣文官依例於每月朔日十五日集合部隊，拜讀《聖諭廣訓》四條，滿兵用滿字本，對於大部落應行巡迴督勵之責。」說明其時滿族軍人還懂滿文。但到晚清同治年間刊刻《三合聖諭廣訓》，恐怕只有象徵意義了。另外，由《清實錄》同治元年三月丁未條，還可見到有一種《三體聖諭廣訓》的書，不知此書是否就是上述的《三合聖諭廣訓》。《實錄》載：「又諭孟保奏：『謹將滿洲蒙古成書，添註漢字刊

板進呈』等語，該副都統留心繙譯所刊三體聖諭廣訓，於辦理清字蒙古事件足資裨益，著准其將板片交武英殿以備刷印。孟保交部議敘。」孟保其人據《實錄》云為副都統，但遍查職官表，咸同之際無一副都統取名孟保者，倒是道光間有一駐藏大臣叫做孟保，乃漢軍鑲黃旗出身，不知與此一孟保是一是二。

八、《聖諭廣訓》的西文版與和刻本

中國的傳統學者對《聖諭廣訓》這樣的書，內心是看不起的，認為這是教導愚民遵守道德規範的教科書，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。但此書出於兩個皇帝的手中，也不能輕視，因此只能據之對學生進行照本宣科式的講解，並沒有多少自己意見的發明。只有地方官因為負有教導民眾的責任，不能不對其重視，但這種重視也僅是實用性的，不是學理性的。但對外國學者而言，《聖諭廣訓》卻是一部重要的著作，一方面是可以藉此了解中國民眾的心態，一方面又可作為研究中國話的材料或學習中國話的教本，對於用中國話進行佈道以及用中文撰寫佈道書頗有好處。所以此書很早已為西洋人所知，特別是傳教士早就加以注意，並將其翻譯

成西文。據現在所知，自一七七八年至一九二四年，西文譯本的《聖諭廣訓》不下十種。其中最早為乾隆四十三年（一七七八年）俄國人 Leontiev 的俄譯本，遲至一九〇四年則有德國人衛禮賢（Richard Wilhelm）的德文譯本。

現在存世最早的歐洲語言的譯本是由米憐（William Milne）於一八一五年末在馬六甲譯竣的，一八一七年在倫敦出版，題名為“*The Sacred Edict, containing sixteen maxims of the Emperor Kang-He, amplified by his son, the Emperor Yong-Ching; together with a paraphrase on the whole by a mandarin. Tr.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*”（直譯為：《聖諭，包括康熙皇帝的十六條箴言，並由其子雍正皇帝加以詮釋，還附有一位中國官員根據中文原義的意譯和註釋》）。此書現在已不多見，但在日本東洋文庫和德國哥廷根大學圖書館還可以找到。該譯本由序跋二十八頁（序跋有四首，首先是英譯者序，接着是雍正皇帝原序以及江寧布政使先福、廣東巡撫韓對刊本跋文的英譯），正文由二百九十九頁組成，不附漢字，只有英譯與註釋。米憐在序中自稱，他是由傳教同事羅伯特·馬禮遜（Robert Morrison）教懂該書的，並認為此書是認識中國人的合適材料，所以將其筆譯出來。其翻譯底本即王又樸的《聖諭廣訓衍》，這由其內容可一目了然。

據云，在米憐之前，《聖諭廣訓》有過兩個俄文譯本，一是一七七八年（一說一七八八年）列昂季耶夫（А.Л.ЛЕОНТЬЕВ，即上文拉丁字母轉寫的 Leontiev）所譯，一八一九年再版；另一是一七八八年阿歷克賽·阿加芬諾夫（А.АГАФОНОВ）翻譯的，題名《聖祖聖訓聖德》，一七九四年再版時改名為《國君——臣民之友》。這兩種譯本都在聖彼得堡出版，但均未曾寓目，詳情不明。在俄國人之後，有法國人 J.de Grammont 於一七九九年將《聖諭廣訓》譯成法文，登在百科全書雜誌上。

另據說，於乾隆末年隨馬嘎爾尼出使中國的英國人喬治·斯當東（Sir George Staunton）也在一八一二年將《聖諭十六條》和《廣訓》的頭九篇翻譯出來，於一八二二年發表，但未見之。一八五九年威妥瑪（Thomas Francis Wade）在其《尋津錄》一書中也對《聖諭廣訓》作了節譯，翻譯時參考了米憐的譯本。還據說米憐之子美魏茶（William Charles Milne）一八七〇年也在上海出版了自己的簡譯本，但亦未曾寓目。至一八七九年，在中國海關工作的外員，法國人比利（A.T.Piry）又以法語全譯此書，並加上註釋在上海出版，法文書名為 *La Saint Edit*。這個譯本是十六開的，厚達三百一十二頁的煌煌巨著。左面一頁為原文（只有文言文，無白話），右面一頁是法譯（見書影），每篇有註釋，如實地記載了漢字發音與有關典故。因為這是在北京同文館教法語用的教材，所以譯文當然是靠得住的。尤其特別的是該書卷末附有三十七頁字彙，不但將《聖諭廣訓》所出現的單個漢字，共一千五百七十六字



的意義的出處列出，而且連其使用頻度也一一計算出來。這是最早計算漢字使用頻度的標本之一。

如果說比利的譯本是漢學式的，那麼英國人鮑康寧 (F.W.Baller) 的譯本就是實用型的了。鮑氏是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，以各種形式的著作來幫助西洋人學習漢語，如編輯漢英辭典與漢語讀本，註釋《好逑傳》等中國文學作品。他翻譯《聖諭廣訓》的詮釋本也是為了同一目的。他以《聖諭廣訓直解》的白話部分為底本進行翻譯，以“*The Sacred Edict,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Colloquial Rendering*” (直譯是：《聖諭，附有白話的翻譯》) 為名，於一八九二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。此書為大三十二開，厚二百一十六頁。由於將《直解》的白話、英譯和註釋揭示在同一頁上，上半頁是漢字原文的《直解》白話（無雍正《廣訓》的文言文部分），下半頁是英譯和註釋，故極便於外國人學習中文之用。既有此優點，此書遂多次再版。鮑康寧在序中說，因為《聖諭廣訓》的白話譯本由很多的重要的慣用語和常識性故事編織起來，因此是中國話的一大寶庫，由此書而學中國話，易於達到圓熟的水平。同時此書也是方言研究的材料，可以與其他地方的方言作比較。不過鮑氏到底是基督教傳教士，不滿足於《聖諭》的內容，批評其僅為高等思維 (high thinking) 和低等生活 (low living) 的結合，認為其缺少基督教那樣的生命力。此書到一九一七年就出到第四版，可見有相當的需求。

另外，為了初學者的方便，鮑康寧還另編了一本 *Vocabulary of the Sacred Edict*（《聖諭詞彙集》），與上述譯本配套行世。

除上述語種外，一八八〇年與一八八三年間有 Successori Le Monnier 其人在佛羅倫薩翻譯出版了《聖諭廣訓》的意大利文本。一九〇三年，在澳門也出版了一種葡萄牙文的《聖諭廣訓》譯本，取名為 *Amplificacao do Santo Doctrato*，是原名的直譯。書的譯者是 Pedro Nolasco da Silva（一八四二—一九一二年）。其實這個譯本本身並不獨立，是一套中文讀本中的一部分。因此譯本的形式與課本相似，每一節先列生字，再將《聖諭廣訓》的本文逐句譯以葡文，再將重要字詞加以註解。全書分十七節，即序言與十六條各一節。每個生字先註以羅馬字拼音，再加釋義，如「鐸 *to*, campainha, matraca」。本文如「視爾編氓誠如赤子」，則譯為：「*Elle sinceramente considerava os seus subditos como filhos*，註解解釋「編氓」的意思說：「編 *registato*（登記），氓 *vassalos, povo*（百姓），isto e, o povo recensado ou registado（也就是在籍人口）。」因為在這句話中，西洋人較難理解的就是這兩個字的意思。其他各節的翻譯大抵如此。

目前所知的《聖諭廣訓》最晚的外語全譯本是德語本，取名為 *Das Heilige Edikt des Kaisers Kang Hi*（《康熙皇帝聖諭》）。此譯本似乎未作為單行本出現，而是分三次連載在

一九〇四年出版的 *Zeitschrift fue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*（《傳教研究與神學》雜誌）上，此雜誌辦在海德堡，而譯者是當時在青島傳教的德國同善會傳教士衛禮賢。此人極其仰慕中國文化，有多種著述行世。在他之前，有另一位在上海的德國傳教士 Kranz 曾譯了《廣訓》的第一條，也登在同一雜誌一八九五年的第十卷第四期上。所不同的是，後者是以官話詮釋本為底本的，而衛禮賢卻是以《廣訓》的原本翻譯的（只有第十五條是以白話本為底本），為了使德語讀者更好地理解原著，衛禮賢在譯文前寫了一段很長的介紹，在譯文中還加了許多註釋，包括介紹中國的人物與故事，並且引用聖賢語錄，法律條文以資說明。譯文明白易讀，而且與他的所有翻譯一樣，用詞高明且與時代脈搏相一致。

除了正式譯本以外，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（Thomas Wade）也在他一八五九年編輯的漢語教材《尋津錄》中對《聖諭廣訓》作了翻譯。另一個英國人翟理斯（H.A. Giles）則在其一九二三年出版的《中國文學精萃》（*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*）一書中，選登《聖諭廣訓》第七條的英譯。另外在澳門出版的西洋人所辦的英文雜誌《中國文庫》上，也不止一次介紹了《聖諭》與《聖諭廣訓》。早在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出版的第一卷第八期上，就有對米憐譯本的長篇評論。在一八四七年的第十六卷上，也有對《聖諭廣訓衍》的詳盡介紹。其中詳細說到，康熙的《聖諭》有一百一十二字，而《廣訓》則有一萬零一十字，並說中國人與希伯

著述年表

專著

- 1 《方言與中國文化》（與游汝傑合作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；繁體版，台灣：南天書局，一九八八年；修訂版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；修訂二版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一五年；日文版，日本光生館，二〇一五年。
- 2 《西漢政區地理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。
- 3 《體國經野之道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〇年；簡體版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。
- 4 《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九八年。
- 5 《中華文化通志·地方行政制度志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。
- 6 《更名》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。
- 7 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》，修訂版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一四年。
- 8 《中國行政區劃通史·總論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。
- 9 《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三年。

論文集

- 1 《周振鶴自選集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。
- 2 《逸言殊語》，杭州：浙江攝影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；增訂版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。
- 3 《學臘一十九》，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。
- 4 《長水聲聞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。
- 5 《耦耕集》（與游汝傑合作）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四年。

學術隨筆集

- 1 《隨無涯之旅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一九九七年。
- 2 《中人白話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。
- 3 《智術無涯》（與張隆溪、葛兆光合著），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。
- 4 《知者不言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〇八年。
- 5 《餘事若覺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二年。

整理校點註釋影印

- 1 《王士性地理書三種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。